

左东岭 著

# 明代心学与诗学

## 要目

- 论王阳明的审美情趣与文学思想
- 狂侠精神与泰州传统
- 论唐顺之的学术思想
- 人格心态与文学思想
- 从本色论到童心说
- 论李贽的文学思想
- 从良知到性灵
- 从愤世到自适
- 阳明心学与汤显祖的言情说
- 明代心学与文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学术丛刊

學苑出版社

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励计划资助

# 明代心学与诗学

左东岭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心学与诗学/左东岭著. -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11

ISBN 7-80060-079-3

I. 明… II. 左… III. 古典文学-文学理论-中国-明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5787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总编室电话:010-68281490 发行部电话:010-68279295

E-mail: xueyuan@public.bta.net.cn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1168 32 开本 13 印张 340 千字

200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册 定价:30.00 元



**左东岭** 1956年生，河南许昌人。1995年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专业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方向与中国诗歌理论史方向博士生导师。2001年获教育部青年教师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尤致力于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学思想关系的研究，先后承担多项国家与省部级以上的课题。其研究特点以求真为目的，重材料，重实证，并善于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主要论著有《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中国历代诗歌选读》（合著）、《中国古代小说史专题》（合著）等，并发表过40余篇学术论文。《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一书获1999年首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著二等奖。《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一书获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著二等奖。

## 目 录

- 陶安与元明之际的社会思潮及诗学思想 ..... (1)
- 论台阁体与仁、宣士风之关系 ..... (12)
- 内在超越与江门心学的价值取向 ..... (26)
- 论王阳明的审美情趣与文学思想 ..... (43)
- 王阳明的归隐意识与明代士人生存空间的拓展 ..... (57)
- 论王畿心学理论所体现的人生价值取向 ..... (69)
- “彻悟仁体”与罗洪先的晚年心态 ..... (81)
- 狂侠精神与泰州传统 ..... (94)
- 阳明心学与唐顺之的学术思想、文学思想及人格心态 ..... (108)
- 耿、李之争与李贽晚年的人格心态巨变 ..... (149)
- 童心说与李贽的人生价值观 ..... (162)
- 顺性、自适与真诚
- 论李贽对心学理论的改造与超越 ..... (174)
- 从本色论到童心说
- 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流变 ..... (191)
- 论李贽的文学思想 ..... (205)
- 从愤世到自适
- 李贽与公安派人生观、文学观的比较研究 ..... (272)
- 郎瑛与《七修类稿》 ..... (286)
- 论张居正的心学渊源及其与万历士人心态之关系 ..... (298)
- 从良知到性灵
- 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演变 ..... (322)

---

阳明心学与汤显祖的言情说·····	(338)
阳明心学与冯梦龙的情教说·····	(354)
心学与明代文学·····	(371)
后 记·····	(408)

## 陶安与元明之际的社会思潮与诗学思想

陶安在现代的明史著作中成为了一个陌生的名字,且不说一般的读者,就是许多研究明代历史、哲学史与文学史的学者,对此名也具有相当的生疏感。其实,这和历史实际是不相称的。陶安在元明之际是位很重要的人物,他不仅是朱元璋的重要谋士,而且其投奔太祖的时间甚至比宋濂、刘基等人还要更早;他不仅参与了元末明初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决策,而且是明初礼乐法律的主要制定者之一;他的诗歌写得清丽劲健,其诗学思想融理气于一体,很能代表明初的诗学主流倾向。但现代学者一谈起明初文人,提到更多的是宋濂、刘基与高启诸人,而当时明太祖赐给陶安的门帖却是:“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由此可知他在当时的地位。但更重要的是,陶安的人生经历与思想特征,典型地代表了那一时期许多文人的共同追求,通过对陶安生平的了解,可以对明初的社会思潮与诗学思想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陶安(1310—1368),字主敬,太平当涂(今属安徽)人。他于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中江浙乡试,被授明道书院山长,任满后即于家乡隐居不出。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提兵渡江,陶安率父老出迎,被太祖留在幕府中为参议。前后担任过左司郎中、黄州知府、桐城县令、饶州知府等职。吴元年(1364),朱元璋初置翰林院,最先将陶安召为学士,并赐予上面所引的那副门帖。明洪武元年(1368),太祖先令其知制诰兼修国史,同年四月又使其出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同年九月卒于任上,时年五十九岁。陶安在后来名气之所以不及宋濂、刘基等人,或许与其病逝过早有关。但就其人生

经历看,在元末文人中是有相当的代表性的。他的一生可以用投奔朱元璋作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退隐自适为主,而后期则主要是出仕为官。他有《文士二首》,集中描绘了这两种不同的人生模式:

文士甘藜藿,林栖阅岁华。一衾春自足,前驷我何加? 雨雪欺茅屋,乾坤任钓槎。今朝烟火晚,带露采松花。

文士经纶学,时来志或酬。玉堂清不夜,金鉴照千秋。白发忧民瘼,丹心为国谋。所期功业盛,富贵一浮沤。<sup>[1]</sup>

依陶安之意,作为一个文士可以有退隐与进取两种人生选择,前者自甘贫贱,不慕富贵,但却可以游山观景,自由自在;后者则要出仕为官,忧国忧民,但却可以建功立业,满足自我之人生大志。至于文士究竟选择何种为佳,那要视“时”亦即时代是否允许而定,如果社会黑暗、官场混乱,那便是生不逢时,也就只能退隐以自保;如果遭遇明主、可有作为,便可乘时而起,经世济民,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业。在投奔朱元璋之前,陶安认为自己所处的是一个乱世,而且看不到任何出路与希望,他在《秩满避乱》一诗中解释其归隐的原因说:“冷官黉舍数年过,秩满其如乱世何? 衿佩有谁谈礼乐,民生徒欲避干戈。归闲故里青霄远,卧病衡门白发多。江上薜萝烟雨里,何时重听太平歌?”<sup>[2]</sup>从个人原因讲,他做了几年清冷的穷教官,得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实在感受不到做官有什么滋味;从时代原因讲,礼崩乐坏,无人问津,干戈遍地,生民多艰。既然自己不能平息乱世,解救民众,那又何必守此穷官不肯放手? 他当然希望太平时代到来,但却看不到实现这种时代的途径,于是只好归乡隐居。归隐的生活当然是艰辛的,此处所说的白发卧病就是最好的说明,但同时也得到了“笑傲浮云上,俯视沧海东”的精神自由,获得了“脱彼事物役,求道有始终”<sup>[3]</sup>的独立人格。不过陶安的归



隐说到底依然是在对时代失望中所做出的一种无奈选择,因为这有违他作为一个儒者的初衷,所以他才会吟出“目送飞云远,还存济物心”<sup>[4]</sup>的诗句,这意味着一旦有了机会,陶安一定会义无反顾地投入救世济民的现实行为中。

果然在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渡江到来时,他终于又萌生出新的希望,从而采取了率父老主动相投的行动。在陶安的行为里,不排除有政治投机的因素,因为他对易学有过深入的研究,知道“冰霜寒闭野,天地暗回春”<sup>[5]</sup>的阴阳盛衰之道理,所以应在乱极而治的过程中抓住机遇,实现自我的政治抱负。但同时他的投奔朱氏政权又决非无条件的,而是看中了朱元璋的人生大志与政治方略。据《明史》记载,朱元璋在攻取太平后,“揭榜禁剽掠。有卒违令,斩以徇,军中肃然。”<sup>[6]</sup>也许正是这严明的军纪,才使得陶安对朱元璋刮目相看,从而主动相投,这从他于朱元璋初次相见的对话里,可以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他说:“海内鼎沸,豪杰并争,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拨乱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应天顺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sup>[7]</sup>在这段话里,有两个重点,一是不乱行杀戮,不掠夺财物,而有救民安天下的目的;二是这样做可以应天顺人,并最终能够平定天下,成就大业。正是与朱元璋的此次遭遇,使陶安的生命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从此踏上了辅佐太祖平定天下的道路,从一个隐士变成了一个谋士。而且他不仅自身走上了这条道路,同时也鼓励其他文人前来共聚大业,他有《寄刘伯温、宋景濂二公》诗说:

水溢中原又旱干,风尘从此浩漫漫。东山好慰苍生望,南国那容皓发安? 要整纲常崇黜黜,还成文物萃衣冠。圣贤事业平生志,幽乐何必恋考槃?<sup>[8]</sup>

他劝说刘、宋二人,国家处于水旱风尘的残败局势中,作为一位儒

者,应该东山再起,大济苍生,使天下恢复到合乎礼义纲常的和谐之中,这是真正的圣贤事业,也是儒者所应该具备的人生志向,而切不可恋恋于一己之适,“考槃”一语取《诗经·卫风·考槃》的典故,即隐居穷处之意,劝刘、宋不要“恋考槃”,就是要他们结束隐士生涯而及时出山为圣贤事业。后来他又有《喜伯温、景濂辈至新京》,其中有“束帛征贤出涧阿,来从明主定山河”<sup>[9]</sup>之句,可见二人的出山是与陶安密切相关的。当然,很难说刘、宋二人出山的原因是由于接受了陶安的劝告,而勿宁说此二人与陶安具有大致相同的认识与人生态度,但说陶安是元末文人中较早结束隐士生涯而走入仕途者,并且对后来的文人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则应该还是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可以说元末明初著名的文人如宋濂、刘基、高启都曾有过这种经历。因此,陶安的先隐后仕的人生道路可以说代表了元明之际相当一批文人的共同人生模式。

从陶安本身的特点与其行为所导致的实际政治效果看,他亦可作为当时文人的代表。从政治思想上看,他是主张儒家的爱民仁政的,所以他在黄州任知府时,便以宽赋税、省徭役为施政方针,从而使百姓悦服,地方太平。后来当他看到“兵后遗黎归故里,渐桑麻,绿映鹅湖岭”<sup>[10]</sup>时,也就感到由衷地高兴。但陶安又决不是一味讲仁施义的迂腐之儒,而是很注意政治的实效的,他的与民休养生息固然有关爱百姓的目的,但同时也是为了发展生产,以保证朱元璋军事集团的后勤供应,据历史记载,他在饶州任知府,“时方征伐,急军需,安劝谕率其民,民皆乐输,而用不乏。”<sup>[11]</sup>可见他是位既有思想又有实际才能的文人,并在元明之际这个合适的历史舞台上,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发挥表现。在陶安后半生辅佐朱元璋的生涯里,应该说是充满了乐观进取精神的,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其人生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有一首《水调歌头·秋兴》的词,可以说对他的现实行为与精神状况进行了清晰的描绘:

秋兴高何远，爽气掬星河。雨晴山势飞动，楼外雁声多。  
丹桂香凝幕府，银烛光摇青琐，试问夜如何？天地大无外，老子尽婆娑。  
写兵机，修马政，咏铙歌。西风莫添白发，壮志未消磨。眼见帝都龙虎，人似仙洲麟凤，留我共銮坡。把酒暂舒啸，明月借金波。<sup>〔12〕</sup>

宋濂曾经把元明之际的诗分为山林与台阁两种风格，认为山林之诗只写风云月露，情调婉转幽渺，而台阁之诗则写城阙兵甲，声调铿锵鏗鞳。可见此时的台阁体，和后来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具有很大的不同。从上面这首词里所表现的内容与情调看，显然与宋濂的概括是一致的。它格调爽朗，境界阔大，完全没有后来台阁体的庸雍肤泛，而是充满生机与力量。“秋兴”历来被中国文人表现为肃杀悲凉的情调，从宋玉的《九辩》到杜甫的《秋兴八首》，均以凄伤情调为主，但陶安显示的却是兴高气爽的昂扬精神，是“天地大无外，老子尽婆娑”的豪迈情怀。他的这种昂扬情调当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具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具体讲就是他“写兵机，修马政，咏铙歌”的充实生活，带来了“西风莫添白发，壮志未消磨”的积极进取精神。他的这种昂扬的精神与刚健的文风，可以说也是元明之际相当一批文人及其诗文作品的典型代表。

陶安之所以能够成为那一时代文人的代表，是因为他的人生理想体现了那一时代共同的社会心理，也可以说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股的强大社会思潮，那就是渴望结束战乱，希望天下统一的共同要求。他有一首《水调歌头·偶述》的词，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表述：

皇天万物祖，生气本冲和。忍令古今天下，治少乱常多。  
血践中原戎马，烟起长江樯橹，沧海沸鲸波。割据十三载，无处不干戈。  
问皇天，天不语，意如何？几多佳丽都邑，烟

草莽平坡。苔锁河边白骨，月照闺中嫠妇，赤子困沉疴。天运必有在，早听《大风歌》。<sup>[13]</sup>

本词应作于朱元璋吴元年(1364)，本年朱元璋称吴王，立太子，建百官，征人才，政权已初具规模。就作者所表现的主旨看，可以概括为反映战乱与渴望统一两个方面，而其间的契机则在于对百姓苦难的同情。词作以疑问始，以自信终，体现了他生生之仁的儒家和谐思想。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对战乱的描绘，对天下统一的渴望，都是从天下百姓的角度出发的。因为在战乱中受害最大的，的确是千千万万无辜的百姓，当元末群雄在历史舞台上尽情表演或悲壮或滑稽的种种剧目时，无疑都是以无数百姓的生命财产为代价的。所以作者对“割据十三载，无处不干戈”局势的记述，对“苔锁河边白骨，月照闺中嫠妇，赤子困沉疴”惨状的描绘，都为后人准确地提供了一幅元末社会的形象图画。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叙写这些内容时，不是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而是始终带着一腔激情。他同情民生疾苦，感叹百姓不幸，希望结束生灵涂炭的现实，让百姓们得以安定休息。这样的情感，要比当年汉高祖所唱《大风歌》的情调可贵多了。正是由于这种真挚情感的灌注，使词人对战争变乱的控诉、对天下统一的渴望具有了正面的意义，以致今日读来犹能感人。渴望统一可以说是那一时代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深受战乱之苦的广大百姓自不必说，就是那些儒士文人，也由于自己的仁民爱物意识，也极想使百姓脱离苦海而休养生息，而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以结束战乱、天下统一为前提。且不说像陶安、宋濂、刘基这些追随朱元璋打天下的文人，就是那些始终在感情上与朱明政权保持一定距离的隐逸之士，在渴望统一这一点上也是没有异议的，如后来被明太祖腰斩于南京的高启，也曾《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一诗中说：“我幸生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sup>[14]</sup>可见陶安的词作与

思想是能够反映与代表那一时代的社会思潮的。

从陶安与朱元璋的关系上看,他们君臣之间在总体上是融洽的,这种融洽当然是建立在上述所言的结束战乱、统一天下此一基础之上的。但在统一之后以什么作为立国的指导思想上,他们之间却又存在着重大差异。这从陶安对待《大风歌》的态度上可以清楚地显露出来,他一面高唱着“天运必有在,早听大风歌”,希望朱元璋能够像汉高祖刘邦那样建立一个强大的王朝,然而王朝的建立并不是一家一姓的兴盛与得意,而应是道德秩序的重建与百姓的休养生息。正是出于此种动机,他专门写了一首《大风歌》的诗,其诗歌结尾处说:“大风起兮云飞扬,不如膏雨流滂滂。威加海内归故乡,不如帝德天下光。安得猛士守四方,不如王佐之才登庙堂,所以汉道不克承三王。”<sup>[15]</sup>汉高祖刘邦通过坚苦卓绝的争战,终于打败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建立了刘姓王朝,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他当然有资格派头十足地衣锦还乡,在众乡老面前尽情地夸耀自己的功业。但陶安认为,要想成就圣贤大业,只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让百姓得到朝廷“膏雨”的实惠,充分感受到帝德之光,同时又能够贤以待士,随才器使,让朝中布满王佐之才,这才是达到了理想的境界。汉高祖没有做到这些,他只会乡亲们面前摆威风,却未能广施仁德,反倒一味地杀戮功臣,所以他也不可能实现“三王”的圣治。在诗歌批评汉高祖的背后,显然寄寓了他对朱元璋的希望与劝诫,提醒他切不可学那位只会唱《大风歌》的汉高祖,而应该追求圣贤之治。这种思路其实在高启的那首《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的诗中也存在着,许多学者都认为,在作品结尾“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的颂圣诗句中,其实隐含着对仁政德治的向往。陶安与高启的担心显然不是多余的,后来的历史表明,朱元璋所感兴趣的,并不是圣贤之治而是专制之治,他废宰相,兴科举,戮功臣,用重刑,目的都是为了加强皇帝的权威,他的统治不仅未能赶上“三王”,甚至连刘邦的水平也没

能达到。可见陶安的感觉是很敏锐的。

在文学创作上,陶安文不如宋濂,诗不如刘基,成就也就有限。四库馆臣评其创作曰:“安声价亚于宋濂,然学术深醇,其词皆平正典实,有先正遗风。一代开国之初,应运而生者,其气象固终不侔也。”<sup>[16]</sup>说陶安名声低于宋濂,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言其“词旨皆平正典实”似乎并不全面,若以此评其散文,或不无道理,但其诗作便不宜用此评语。相比较而言,清人陈田论其诗风似较准确:“主敬初谒太祖,首陈王略;不杀人,不虏掠,首取金陵,以图王业。有诸葛君、王景略一辈气象,诗亦清劲,不愧雅言。”<sup>[17]</sup>用“清劲”二字概括其诗很是恰当,“清”自然有儒家传统诗教之雅正包含其中,但亦有脱略凡俗之逸气融于其内。而无论是儒者之雅正还是道家之超逸,都有独立之人格与高昂的气势贯穿其间,因而也就有了充满力度的“劲”健。由上引陶安之诗词即可感受到此种“清劲”之风格,具体讲也就是境界阔大,格调爽朗,情感深厚,气势充沛。

以此创作特征为基础,形成了陶安自身的诗学思想特征,这便是既追求理之正,又重视气之盛;既强调关注现实政治,又倡言陶冶自我性情,从而明显地表现出元明之际的过渡文学思想特征。他在《张景远诗集序》里说:“且诗亦难矣,苟培蕴丰硕,志端而远,气充而弘,则形于咏歌自中律度。”<sup>[18]</sup>作诗的前提是“培蕴丰硕”,也就是主体人格的修养培育,这已是儒家有德者必有言的思路。“志端而远”的主要内涵当然是强调“正”,而此一“正”字又有其具体规定,这便是陶所反复论说的“万象变幻道为宗”、<sup>[19]</sup>“考亭理趣明如日”,<sup>[20]</sup>“洙泗既删定,汉魏渐浮华。贵不失性情,当知有正葩。”<sup>[21]</sup>也就是说同是以道为宗,而这道又体现为朱熹的“理”,此道此理远承“洙泗”亦即孔子之诗教,近接朱子等宋儒的性与理。从此一角度讲,陶安带有江西学者鲜明的理学倾向,开了明前期江西诗学以理为宗的先河,后来此一倾向被刘崧、杨士奇等人所发挥,形成了统治文坛数十年的台阁体诗风。但与其后继者不同的

是,陶安在讲理道之正的同时,他同时还强调“气充而弘”,即气的充实与宏大。这种观点很显然是来自唐代的韩愈,所以其气的充实宏大必以道义为基础。但在此要指出的是,该气之中不仅有道与理,更有深厚的情感与刚直的个性,因为气在中国传统文论中历来就是个诸般要素混合而成的整体。将此一思想表述最为充分的,是其《诗盟记》:

余尝评诗自洙泗删后,汉魏以下,作者迭兴,间有调高意远,终未足媲美三代。自《感兴》诸诗一出,融畅天人,权衡经史,以性命奥学寓于音节韵度中,较之《古诗十九首》、陈拾遗《感遇》,理致悠深,气格苍古,直可追逐风雅,是又诗之一助也。故善诗者一本于心,充积汪洋,遇物发机,吐辞成声,则骨干伟杰,神采焕扬。不假雕组,自中矩矱,若夫求工于绮靡纤巧之余,受窘于拘挛掇拾之际,余窃病焉。况是盟也,因诗为会,叙坐以齿,筮豆有差,兴其孝悌揖让,俾之即吟咏以和性情,幽穷得以纾其郁,荣达得以约于正,会六义之旨归,岂止争一句一韵之奇也哉!<sup>[22]</sup>

陶安在孔子删诗之后,特意提出朱子之《感兴》诗作为“追逐风雅”的榜样,甚至将其置于《古诗十九首》与陈子昂的《感遇》诗成就之上,评价不可谓不高,而其长处则主要是能够“以性命奥学寓于音节韵度中”,说简单些就是能够在诗作中寄寓道理。这是典型的理学诗的路子,这显示出明代诗学理学化倾向的最初苗头。但从艺术效果上看,陶不仅要求“理致悠深”,同时也要求“气格苍古”。而达此效果的条件首先是“一本于心”,他没有说一本于理,而是将统合情与理的心作为诗的发生第一要素。然后是“充积汪洋”,这就又谈到了气,而且是浩大充沛之气。再有便是“遇物发机,吐辞成声”,也就是必须拥有感物而起的“诗兴”,这便又强调了中国古代

诗学中最具审美价值的兴象内涵。最终所形成的体貌乃是“骨干伟杰，神采焕扬”风骨之劲健美。正是具有如上的诗歌发生理论，所以才会有以下的诗歌功能理论，即既重视“荣达得以约于正”的教化功能，更强调“幽穷得以纾其郁”的自我宣泄功能。元明之际的主流诗学思想大致是以理与气为核心的，但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一般地说，元末言理与气多从诗人个体的节操人格着眼，主要表现在对民生疾苦的同情与社会混乱的讽刺；入明之后言理与气则多从外在的礼教与朝廷的气象着眼，主要表现在对民众伦理的教化与国家太平之歌颂。从诗歌的要求上讲，元末虽也提倡节操道德等内容的表达，但同时也重视诗歌的文体特征与审美效果的获得；入明之后虽也讲诗乃文之精者的体式差别，但更重视教化的内涵而轻视审美的效果。陶安的诗学思想带有明显的过渡特征，它既强调道与理在诗学中的位置，但也不忽视情与气对诗学的重要。

陶安在洪武元年病逝实在是他的不幸中之大幸，因为他免去了后来许多文人所遭遇的坎坷命运。同时在诗歌的创作与理论上，由于他的早逝而表现出较少的虚假之作与违心之论，他的诗风是爽朗的，而没有刘基入明后的忧心忡忡、叹老嗟穷；他的理论是真诚的，无论是强调理还是推崇气，都显得底气十足，而没有宋濂的小心谨慎、心口不一。但同时他的早死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其在历史上的影响，以致这位曾经在元明之际发挥过巨大作用且又思想丰富的重要历史人物，几乎被后人所忘却，从而今天不得不动用一定的笔墨加以叙述评说。

#### 注释：

[1]《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陶学士集》卷三。以下引《四库全书》本，均为此版本。

[2]《文渊阁四库全书》，《陶学士集》卷五。



- [3]《文渊阁四库全书》，《陶学士集》卷一，《题何氏心远楼》。
- [4]《文渊阁四库全书》，《陶学士集》卷三，《幽居十首次监郡韵》。
- [5]《文渊阁四库全书》，《陶学士集》卷三、卷五，《读易》。
- [6]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卷一，页4。
- [7]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卷一三六，《陶安传》，页3295。
- [8]《文渊阁四库全书》，《陶学士集》卷五。
- [9]《文渊阁四库全书》，《陶学士集》卷五。
- [10]《文渊阁四库全书》，《陶学士集》卷十，《金缕曲》。
- [11]徐紘：《陶安传》，载《明名臣琬琰录》卷九，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
- [12]《文渊阁四库全书》，《陶学士集》卷十。
- [13]《文渊阁四库全书》，《陶学士集》卷十。
- [14]高启：《高青丘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十一，页451。
- [15]《文渊阁四库全书》，《陶学士集》卷十。
- [1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卷一六九，页1465。
- [17]陈田：《明诗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页94。
- [18]《文渊阁四库全书》，《陶学士集》卷十三。
- [19]《文渊阁四库全书》，《陶学士集》卷二，《病中友人寄诗遂以次韵》。
- [20]《文渊阁四库全书》，《陶学士集》卷七，《学诗》。
- [21]《文渊阁四库全书》，《陶学士集》卷三，《题杨生诗集》。
- [22]《文渊阁四库全书》，《陶学士集》卷十六。